

王鸿儒 著

贵
州

少数民族作家笔耕录

贵州民族出版社

·7

责任编辑 黄仕日
封面设计 吕凤梧
技术设计 姚南平

贵州少数民族作家笔耕录

王鸿儒 著

*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八角岩省政府大院内)

铁五局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8.25 印张 200 千字

1990 年 10 月贵阳第 1 版 199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册

ISBN7-5412-0132-4 / I · 44 定价: 5.20 元

(云南新华印刷厂激光照排)

BF85 111

I206.7
547
2



作者及夫人许树慈

摄于贵州社科院(1989年)

作者简介

王鸿儒，贵州福泉人。1943年出生。1964年毕业于贵州大学中文系，1980年结业于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班文学专业。现为该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作家协会贵州分会理事。著有《蹇先艾评传》(二人合著)、《贵州当代文学概观》(三人合著)、《贵州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概观》(四人合著)及长篇历史小说《盛唐遗恨》，发表论文八十余篇。

B 044304

序

李入哲

一本企望许久的书终于写出来了，题名《贵州少数民族作家笔耕录》。全书共20万字，论述和研究我省苗、布依、侗、彝、仡佬、满、纳西等民族的27位作家的作品和创作道路。著作者是我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王鸿儒先生。几年来，他一直关注着我省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在积累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然后根据不同民族不同作家所取得的实绩出发，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或采取美学的或社会学的或心理学的或民俗学的以及比较方法来予以观照，并力图在写作方法上打破以往一般论述的学究气，或以传带评，或以评带传，或评传结合。同时强化著作者的主体性，写出他眼中各个作家的人品与文品，以及他们在创作上所具有的个性特色。行文自然亲切，是一部具有可读性的学术著作。

在翻阅这本书稿时，我忽然想到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文化，那将是一件不可思议的问题。记得法国思想家圣西门在其《寓言》中就提出两个极为有趣的假定，他说：假如法国突然损失掉自己50名优秀的物理学家，50名优秀的化学家，50名优秀的数学家，50名优秀的诗人，50名优秀的作家，50名优秀的军事和民用工程师……法国马上就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假如法国只是失去国王的兄弟和那些王公大臣、参

事、议员、主教以及那些养尊处优无所作为的省长和将军……法国绝不会因此而带来什么不幸。列宁很欣赏这两个假定，并把它们摘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标为“圣西门的名言”。

在中国历史上，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冒出了一个不喜欢文化和文化人的群落，致使文化发展的道路坎坎坷坷，崎岖不平，文化人也因之命运多舛。在他们眼中象牛顿、瓦特、克普勒这些人的劳动还不及一匹马一头驴或一条牛的生产。这么一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断地遭到厄运。“文革”期间他们所受到的严重摧残自不必说了，就以眼前的情况来看：一方面楼堂馆所在大修特修，而另一方面小学生们却不得不挤在危房里上课，连课桌都没有；一方面高级豪华小轿车在大量进口，官员们为争坐高级轿车而争吵不休，而另一方面专家教授们呕心沥血的学术著作却一批批地被冻结而无法出版……凡此种种，出于忧国忧民之情，即使象冰心老人那样撕人心肺的含泪呼吁，也无济于事。这一切努力仿佛就象加缪在他那《西西弗神话》中所描述的那个悲剧性人物为诸神所惩罚那样，让他一次次把巨石推向山顶，巨石又一次次从山顶滚下来。在这种情况下，王鸿儒先生本可以改行做生意或编写一些从俗媚世的畅销书，然而他却矢志不移地耗费了几年的工夫写出这本“笔耕录”，实在也是一桩值得称道的事。

我认为，中华文化应当是生息在这块版图上的各个民族所共同创造，同样中国文学史也应当是各个民族所共同创造的文学史。我国的儒、释、道三家，孔子就是东夷人，老子是南蛮人。以往说汉承秦制，那是指的政治制度而言，如果从文化方面来看，应当是汉承楚绪。

楚文化主要是苗蛮集团创建，而楚国的君臣也都自称“我蛮夷也”。李唐王朝是我国历史上所出现的一个辉煌灿烂的文化高峰，这除了当时李唐王朝大量吸收外域文化所致外，还有一大批少数民族的文人、诗人共同参与了创造，比如初唐时期的窦威、长孙无忌、谢偃、长孙正隐、元万顷、元希声等等；盛唐时期的元结、元季川、元有直、贺兰进明、豆卢夏、赤狄履温、元德秀、独孤及、宣芬公主等等；中唐时期的元稹、李泌、刘禹锡、独孤绶、长孙佐辅、繁知一、符载、符子璠、豆卢回、钱干著、万俟造、宇文鼎等等。上述这些少数民族文人、诗人有的是鲜卑族，有的是匈奴，有的是维吾尔，有的是氐羌，有的是巴人，他们的诗文都写得很有才气。比如宣芬公主的诗，以其艺术造诣来说就不亚于后来者的朱淑贞、李清照等人。然而遗憾的是，在我国文学史上除了元结、元稹、刘禹锡外，其余的似乎都为历史的烟尘所淹没了。以后的宋、元、明、清各朝，也都有不少杰出的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比如为大家所熟知的萨都刺、蒲松龄、关汉卿、曹雪芹等等。

然而不论是李唐王朝或其他各朝各代，促成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与繁荣大抵都并非出于自觉的作为。那么，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我以为就应当比古人做得更自觉和更有成效。从这一角度来说，王鸿儒先生的这本论著也就有了更多一层的价值和意义。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认为王鸿儒先生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过我记得鲁迅先生说过，世上本没有路，人走的多了便也成路。这句话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仍然还有启迪，况且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事新人赶旧人，那么，未来也就充满着希望。

目 录

序	李人哲
苗 族	(1)

陈 靖：书剑风云中的红军作家

伍 略：一个极不安定的艺术灵魂

石 定：新旧交替中的黔北乡土

潘俊龄：苗家新时代的芦笙手

覃智扬：生命需求的不断探索

梁国赋：观念转换中的人生世相

吴恩泽：梵净山区的乡风民情

布依族	(72)
-----------	--------

汛 河：从诗乡歌海走来的诗人

罗国凡：渴望民族自强的反思

弋良俊：宜雅宜俗的艺术追求

王文科：为生活着彩的信念

王泽洲：为人生而亮开歌喉

运 春：追逐寻找那野山之魂

罗大胜：努力提高通俗小说的品位

罗吉万：追踪民族的文化心理

蒙 萌：人格主题的初步开掘

侗 族 (153)

滕树嵩：刻意发掘民族的气质

谭良洲：侗寨月夜与作家诗情

刘荣敏：侗乡风俗与时代变异

袁仁琮：热情塑造山里人形象

彝 族 (187)

苏晓星：文学创作的挚着追求

龙志毅：忧患意识与文学生涯

熊正国：民族干部的文学视野

安文新：让创作更加贴近生活

满 族 (227)

王 安：战士情怀与爱的呼唤

纳西族 (236)

和国正：市井风情的美学观照

仡佬族 (245)

戴绍康：变革时期的农村躁动

自 跋 (253)



陈靖：

书剑风云中 的 红军作家

中年以上的读者和电影观众，大概都还记得苗族红军作家陈靖和他的《金沙江畔》。这部中篇小说以及据此改编摄制的同名电影，在建国初期，同其它许多描写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一样，曾经哺育了整整一代人。“这是长征亲历者的作品”，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963 年编写出版的《十年来的中国文学》一书，高度评价过《金沙江畔》以及陈靖与人合著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红军不怕远征难》，肯定这些作品“描写了那震动世界的伟大历程中的一个片断”，“有朴质简练的长处”。十年浩劫之中，陈靖惨遭迫害，身陷囹圄。他的名字与他的作品一道，在文坛上消失已久。直到粉碎了“四人帮”，他才焕发出新的创作热情，连续出版了诗集《长征路上》，剧本《贺龙前传》，散文集《往事情深》，并承担了大型传记文学《贺龙传》的写作任务。数十年来，他发表了上百万字的作品，以各种文艺形式，致力于反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我党、我军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使革命先辈的浩气得以长存，让他们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精神不停顿地影响和教育着子孙后代。这位红军作家的努力难能可贵。而他的文学成就，不仅丰富了贵州少数民族书面文学的库藏，也为

贵州少数民族作家，增添了一份无上的光荣。

那是 1982 年夏天，我赴南京出席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召开的学术会议，会上结识了陈靖。听着他那一口未改的贵州乡音，一下子缩短了我们老少两代人之间的距离。我们亲切地谈起故乡，谈起共同关心的创作问题。我惊奇地发现，这位老红军作家不仅对贵州故乡怀有深挚的厚爱，而且学识渊博，思想活跃。他在小组讨论会以及大会上的发言，博得了与会专家和学者们热烈的掌声。然而在参加红军以前，他仅只念过二年小学。他以这样的文化底子，后来竟成为我军可数的几位红军作家之一，这本身就是一个谜。带着强烈的好奇心，我了解他的身世，回顾他参加革命的历程，研读他的作品，终于渐渐明白了他的为人与为文。

1918 年阴历 6 月，陈靖出生在贵州省瓮安县猴场陈家湾一户贫农家庭里。他的父亲原是“护国军”司令蔡锷的部下，他不仅给了陈靖一副强健的体魄，也给了他一颗耿直、倔犟的心灵。他的母亲是一位苗家的女子，“会唱千首山歌，能讲万个故事”。陈靖自幼在母亲那儿便受到苗族民间文学的熏陶，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5 年冬天，贺龙、任弼时同志率领的红二方面军长征经过陈靖的家乡，他参加了红军，当了一名司号员。在贵州境内的一次战斗胜利结束后，部队召开联欢晚会。战士们欢迎这位新战士唱一支贵州山歌，他联想到自己参加红军的经过信口便编唱起来：

走了一山又一山，
肚皮走扁腿走酸。
刀山火海难不倒。
不见红军心不甘！

他的歌声赢得了战士们热烈的喝采，这时正站人丛中观看演出的贺龙同志兴高采烈地喊道：“好啊！把这娃儿拉出来，送到宣

传队去!”就这样，陈靖成了红军的一名宣传队员。

红军宣传队的生活，紧张又艰苦。这些年岁不大的孩子，长征中几乎每天都在赶路。每天清晨起来，在部队开拔之前，他们得背上一捆头天夜里写好的宣传标语，赶到先头，沿途散发张贴；下午还要参加后卫团一道搞“收容”，常常是夜幕已降，才能赶到本队宿营。在从前卫到后卫的一路上，每个宣传队员，除了要书写和张贴数以百计的标语，还要进行一至三次宣传鼓动工作。他们的鼓动棚往往就设在山头、险路或渡口上。部队到了，便开始吹拉弹唱，有时还要为战士们烧开水，给伤员们熬稀饭。部队宿营之后，他们有时还要去调查和没收土豪的财物，布置召开群众大会，扩大红军。待到战士们进入梦乡，他们才又开始编写第二天用的标语。标语上有的是宣传口号，有的便写成诗歌。宣传队员们即兴而作，自编自写，陈靖《长征路上》诗集中的许多诗歌，都是在这种情况下的产品。

这是他在鸭池河畔歌颂红军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过乌江》：

远看象条索，
近看鸭池河。
敌人拼命堵，
老子硬要过。
要过要过就要过，
李觉送行蛮不错。
你在对岸站岗哨，
我在这里洗洗脚。

这是他在草地上赞颂红军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诗篇：

牛皮鞋底六寸长，
长征路上好干粮。
开水煮来别有味，

野火烧后分外香。
两寸拿来煮野菜，
两寸拿来做清汤，
一菜一汤好花样，
留下两寸战友尝。

仅从上引二首便可看出，陈靖的诗歌真实地记录了红军的生活，红军的战斗和艰苦的征程。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长征》一书中曾经这样说过：长征“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陈靖的诗虽然表现的是红军的英雄气概，实际上也正显示出人类精神被唤起之后产生的无穷无尽的“威力”。他的《过大雪山》、《玉龙山》、《摸敌堡》、《打骑兵》以及《十二月长征歌》、《排歌连唱》、《散歌对唱》等等，不仅可以成为对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珍贵教材，也可以视为人的力量的真实展现。正如陈靖自己说过的：这些诗的产生，“完全是由于战争，工作任务的需要，象战士拿起刺刀同敌人拼杀一样，只想到要把敌人压倒，别的没有想过。”又因为它们是以民歌体的形式出现，有腔有韵，质朴简练，因此极易流传，在红军翻越义敦山雪峰时，有一个班的九名战士，已经倒下了六名，最后的三位同志在半昏迷中听到了陈靖的鼓动诗，浑身立刻增添了力量，挣扎着站起来，一口气又爬上了山顶。后来部队的一位老医师把这种精神的力量，比作“肾上腺素”，认为只要注入战士的心灵，就会产生战胜困难的威力。陈靖的诗之所以能受到红军战士的喜爱，与这种战斗号角式的内容以及易唱易记的艺术形式有密切的关系。而诗人在战争年代留下的这些歌谣体的新诗，对于中国歌谣的发展，无疑也产生了推动的作用。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了。陈靖所在的八路军某部开赴抗日前线，直抵北平城下。在平西根据地，他担任了“挺进剧社”社长，从事抗日戏剧活动，亲自担任编、

导、演。他们的战地演出不仅鼓舞了抗日军民杀敌的勇气，也提高了陈靖的文艺修养，奠定了他以后从事电影、戏剧文学创作的基础。抗战胜利后，陈靖调到晋察冀野战军炮兵部队工作，历任团、师政治部主任等职，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度过了他整个的青春年代。全国解放时，陈靖任华北特种兵政治部主任，随同部队进驻首都北京。和平环境带给陈靖较多的阅读机会，他从中外名著中汲取了大量的文学艺术的营养。那时候，北京城里的大、中学校，常邀请他和别的红军战士去作报告，渴望了解革命走过的光荣历程。陈靖面对他的青少年听众，讲述着雪山、草地的故事，仿佛看见了那些倒在长征途中的战友。他感到一种崇高的使命，在心间如同烈火升腾：他应该把先烈们光荣的业绩，英勇献身的精神传扬开去，这时候他读到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读到了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文学创作的神秘感在他面前破除了，他开始悄悄地进行准备工作。

有一天晚上，陈靖应邀去观看李伯钊同志创作的歌剧《长征》。李伯钊原是他长征途中认识的第一位从事红军戏剧工作的老师。在座谈会上，她鼓励陈靖也拿起笔来，反映长征生活。李伯钊的话，更鼓起了陈靖的勇气。1955年，当他从南京军事学院结业归来，担任空军某部政治部主任之后，在他的助手黎白协助下，终于完成了长篇小说《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创作。不久又再度创作了中篇小说《金沙江畔》，改编之后由天马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接着又有二十多家地方剧团改编演出，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红军不怕远征难》还被列为当时青年读书运动的推荐书目，曾经感动了千千万万的青年读者。

陈靖清楚地知道，要通过一部长篇和一部中篇，反映长征这样举世闻名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全貌，是不可能的。因此在《红军不怕远征难》里，他同合作者选取了其中的一个片断，通过一支红军先头部队——前卫连在云南、西康等地所遇到的国民党军队

的阻击，追赶，以及在藏族地区和亘古无人烟的雪山上所遭遇到的种种困难，表现出红军指战员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颂扬了他们为革命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这是高度的概括，也是形象化的再现。

前卫连在征途中遭遇的困难颇具代表性。在同主力部队分开之后，他们既要对付敌人的追击、堵截，又面临着恶劣的自然环境的侵害。不仅过雪山随时可能丧生，就在平常的行军中，也随时遭逢断水、断粮的威胁。而敌人制造的民族隔阂和民族仇恨，更造成了红军前进途中难以逾越的障碍，但是红军指战员李冬生、张孟华、何强、孙英以及王大田、王二田兄弟等人，都以超乎寻常的毅力，深厚的阶级感情，顽强的战斗意志，不仅闯过了逆境，而且扩大了红军，维护了民族政策，翻过雪山，赶上了大队。正是在这一系列的矛盾冲突与恶劣环境之中，作家成功地塑造了英雄们的群象。小说的情节生动曲折，尤其是阻击敌人、山口抢水、雪山勇进等章节中，更写得有声有色，动人心弦，具有感人的艺术力量。

中篇小说《金沙江畔》仍以金沙江畔的斗争为背景，在人物设置与情节安排方面同长篇小说《红军不怕远征难》有相似之处，但小说主人公——指导员兼连长金明的形象，则刻画得更为鲜明突出。作家又以更多的笔墨，描绘了藏族头人的女儿珠玛从误解到参加红军，并为革命献身的过程。尤其可喜的是：陈靖在创作这部中篇时，还突破了当时一般反映部队生活，特别是写长征题材时，视爱情描写为禁区的限制。在金明同珠玛的爱情描写中，展示出作家对表现人的美好感情及其欲望的理想，因而获得了较为生动的人性内容。在两部小说的艺术描写中，无论是写长征途中的景物，当地人民的习俗，或是描绘战士的情怀，战斗的场面，也都真切可见。作家如实地创造了长征经过金沙江畔时自然条件艰险，政治情况和战斗任务都十分复杂艰巨的典型环境，

而红军之以超乎寻常的毅力，克服了各种艰难险阻，其所洋溢着
的革命英雄主义及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正与五十年代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相吻合，因而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能够获得众多的读者。又由于采用单线发展的情节结构方式，使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更能引人入胜，这也是两部作品能够吸引读者之处。不过这些作品都未能脱离作家亲身经历的局限，人物、场景的描写不够细腻，敌方人物或藏族上层人物的性格刻画不够鲜明，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小说的艺术质量。尽管如此，这两部作品仍然得到了应有的较高评价。1958年，陈靖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以他谦虚好学的精神，热情诚恳的态度，同文艺界著名人士邓拓、梁斌、王林、阳翰笙、黄胄、吴祖光夫妇等，成了时与往还的知交。在相互的切磋之中，不仅进一步提起了他创作的兴趣，同时也提高了他的创作水平。

正当他在业余创作中大可奋进的时候，他的耿直的个性，为党的事业负责的精神，遭到了所在部队某些领导人的忌恨。他的业余创作也被视为“不务正业”，“追名逐利”而受到非难。1962年，他终于被调到昆明，担任空军部队昆明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在极左之风刮得愈来愈盛的时刻，他既不盲从，又不安分，公然批评林彪提出的文艺创作应当“三结合”的指示，要求他属下的部队创作人员掌握“想、新、创”三个原则，“打破框框，不要墨守成规”。别人一股脑儿在提倡“大写十三年”，“大写英雄人物”，他却说“可以写凡人小事，因小见大”。他公开宣传自己宁愿读西方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作品，不喜欢“大跃进”的虚假文学，不喜欢“大跃进”的电影和戏剧。他甚至对部队作者们说：“创作可以压倒一切，吃饭走路都要想创作，要成‘疯子’，现在你们还不到那个境界。”他反对搞“形而上学”，反对把毛泽东著作奉为“圣经”，搞形式主义。他对战士们说：“什么书都可以读，什么戏，什么电影都可以看一看。”“学毛著不要什么时候都学，要善于想。有时候虽

然没有学，想也可以代替学。”在指导部队文艺工作时，他坚持按照文艺规律办事，反对把文艺工作政治化、庸俗化。在审查战士演出队的节目时，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口词，通篇标语口号，他提起笔，毫不客气地划掉了。一个部队文工队来到昆明演出，他接待了他们，肯定了他们的成绩，也指出节目中的缺点。看了一个《把芒果送给毛主席》的小演唱，他坦率地说：“什么都送给毛主席，太一般化了。”……

多么可贵的胆识。但当运动到来之际，这一切都会成为他的“罪名”。他终于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便作为部队“横扫”的重点，轮番批斗，隔离反审，乃至全家被扫地出门，他也被押解到广西鹿寨劳动改造。在艰难的日子里，他受尽非人的折磨，多少次被打昏之后，又苏醒过来，却心念国家的前途，民族的未来，在一首《卜算子·咏梅》里，他深情地表达了心中不平却又坦然的情怀：

为报春光讯，
驱霜逐雪开。
百花争春亮艳时，
却被万人踩。

他当毒草除，
你用污泥盖。
环顾青山情不尽，
仍愿春常在。

春天终于归来了。粉碎“四人帮”之后，陈靖身心获得了解放。他也调到了南京炮兵司令部工作，担任了“顾问”。他的业余创作突飞猛进。从1977年开始，至1978年，两年间，他便发表和出版了大量作品，总计不下40万字。这些诗、文、戏剧，无一不以革命历史的题材。他决心用他的笔，热情地描写和歌颂被

“四人帮”一伙诬蔑贬低得一无是处的“老家伙”，他如实地记录了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革命先烈与日月同光的不朽功勋，决心为他们树碑立传。这充分表现出一个老共产党员，一个红军作家的党性和气节。

他也不能忘记在同青年朋友们闲谈时，一位青年朋友对他提出的恳求：“你们这些老红军战士，这些历史的见证人，应当站出来说话，为人民，为革命后代，作一点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工作……”

这也正是他的宿愿。十年灾难结束了，百废待兴，而党和革命家们的形象却受到了严重的贬损。如果说从前陈靖为老革命家立传更多的是激于义愤，那么青年们的期望则使他意识到了另一层更重要的责任，“为育后代写英烈”，这便成了他重新开始文学创作的出发点。

他的《贺龙一生纪略》等作品不再仅仅是一般地为贺龙恢复名誉，他是站在塑造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艺术形象的高度上来处理这一题材的。他力图在中国社会的典型环境中，把贺龙作为一个投身于革命的中国农民的典型，来展示出他的战斗、前进的革命历程，从而揭示出中国革命的本质力量。这种认识，使得陈靖的创作，开始进入成熟的阶段。而两集大型话剧《贺龙前传》则是一个显著的标志。

《贺龙前传》以贺龙两把菜刀起义的故事为序幕，通过誓师北伐、进军南昌、突围南溪、上海脱险、重返洪湖、长征北上、会师陕北等一系列情节，生动再现了贺龙 1916 至 1936 年 20 年间的主要革命活动，充分表现出一个坚定不移地跟随中国共产党前进的爱国将领，怎样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斗历程。全剧热情地歌颂了贺龙在同国民党右派及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者斗争中的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集中笔力刻画出他无私无畏、英勇顽强、是非分明、爽直可爱的性格特点。剧中还塑造了周恩